

內陸新疆的漢廟和媽祖廟

在巴里坤和新疆其它地區的多類型漢廟祭祀，和中原文化的淵源密切相關。巴里坤文廟顯然是中原文化在西北邊陲涵化的結果，而關帝廟則是武廟，它成了統一中華安定邊陲的象徵。來到邊陲的屯駐者修建土地廟和娘娘廟等，有明確的安居樂業和家族延續的功能性需求。那些地方會館式的山西廟、秦州廟、甘州廟或乾州廟廟會上濃厚的人情味，帶給屯墾戍邊的內地人無限的安慰。數百年來，在巴里坤來自內地的人經營了七十餘座廟宇。現在，巴里坤文管所的研究人員正以濃厚的興趣參加對閩籍屯民後代的追訪工作。他們確信，移民從一個文化區域轉入另一個文化區域以後所發生的文化連續性與適應性變遷的情況，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不僅中原地區流行的廟宇可以在新疆出現，而且東南沿海的神明信仰也會在巴里坤留下痕跡，其中包括海神廟和馬〔媽〕祖廟。

屯駐與移民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巴里坤，地處天山北部，古稱蒲類國。早在西漢時曾屬設在烏壘（今輪台東）的西域都戶府統轄。《漢書·西域傳》說“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戶治所三千三百八十七里。”《後漢書》則記述這裡“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做弓矢。國出好馬。”

巴里坤地望遼闊，水草豐美，農牧皆宜。不僅如此，它還因其四面環山，進可攻，退可守，歷來是兵家爭奪之地。因此，從唐代起明確記載了軍隊調動和屯田的事實。例如，唐貞觀年間，“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杜爾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縉帛為軍資，

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挽羊馬。”（《舊唐書·土蕃傳上》）《唐六典》卷七記載唐在西域的屯田中伊吾軍屯，而伊吾軍兵卒軍屯的地點就在今日巴里坤的大河鄉古城遺址。考古發現，大河古城分主城和附城，城中有房舍遺址和倉儲遺址。史書則記載，在那裡有三千人屯田，墾殖五千畝地，養馬數百匹，並且從事小麥、豆類和苜蓿種植。實際上，巴里坤就有在三千年前農耕的考古發現，漢代大體已開始屯田，但像唐代這樣大規模的屯田是從來沒有的。⁽¹⁾由於巴里坤處於控制西域的咽喉地帶，可見唐朝在蒲類屯田，以示對這一國防要地的特別重視。

到了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準葛爾汗策妄阿拉布坦背叛清王朝。清王朝授吏部尚書富寧安為靖逆將軍，命其率三萬大軍駐紮巴爾庫勒，運糧貯於哈密，巴爾庫勒改名為巴里坤。次年開哈密沁城、巴里坤等地屯田。這是清朝在新疆屯田的開

* 莊孔韶：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和人類學系博士後。現任中央民族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實驗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著有《教育人類學》、《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人類學通論》。1997年獲CCK國際學術交流基金，獲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記錄片攝製和社會文化研究基金，獲2001年德國萊比錫/柏林電影節“20世紀中國紀錄片精選收藏”殊榮（導演《新疆街懷想》記錄片）。本文為作者應邀參加2001年10月澳門媽祖文化旅游節舉行的“媽祖文化研討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所提供的論文。本論文合作人：周軒、許學誠。



始。⁽²⁾富寧安把巴里坤經營成西進的大後方，種田養馬，向前線輸送軍隊和給養，安定了社會秩序。雖經朝代更迭，巴里坤的地位依舊，再一次表明了穩定西域和巴里坤屯墾戍邊的重要關係。

清朝統一後的新疆，移民屯墾戍邊主要有三種：1) 國家直接經營的軍屯。起初的形式為輪流屯兵。第一批軍人屯兵三五年後返回關內，屯地交由第二批軍人屯駐。但後來發現調動軍人屯田，糧餉雙料，又換防千里之遙，徒增國庫開支，於是清廷鼓勵屯兵攜帶家眷移居屯兵地點，生活費用官給。此後，在巴里坤屯兵的分地是二十二畝，每屯兵給一馬或一牛，糧產賞罰分明，積極的屯兵政策造成了良好的效果，以至軍屯之外的民屯日益增多。2) 招募移居與自費移居。一是就近從內地的河西等地招募貧苦農民，應募的移民有官府提供車輛、口糧、衣物和帳篷，委派專人護送移民到達屯墾地點。一是鼓勵內地人民自費移民屯墾。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秋，陝甘總督文綏在巴里坤看到，

“城州嘉禾盈疇，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甚廣，頗為豐美。該處地廣糧賤，謀生甚易，故各地民人相率而來，日益輳集。”⁽³⁾待後來移民新疆的局面打開，不等招募而主動出關的移民不可勝數。3) 遣犯屯田。新疆在漢唐時期即為流放地，清乾隆皇帝在統一新疆之初就多次頒佈諭旨，下令將發遣黑龍江等地的免死減等人犯，改發巴里坤從事墾務，並從巴里坤推廣至伊犁一帶，以後又擴展到天山以南。據《西域圖志》卷三二屯政一記載，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到三十二年（1767），巴里坤共移入遣犯350名。其中1758年山東的半數犯人均遣入巴里坤。⁽⁴⁾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馬跡嶺吳家大族以為非作歹罪，三十餘戶百餘人發遣甘肅和新疆，其中吳宏基等“七戶遞發巴里坤”。⁽⁵⁾其後亦有閩臺犯人遣入，如偷渡臺灣的客頭船戶。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規定不法客頭船戶內有積慣在沿海村鎮引誘包攬招集男婦老幼數至三十人以上者，無論已未登舟，一經查獲，即將客頭船戶年力強壯者，發遣新疆給種地兵丁為奴。⁽⁶⁾如臺灣械鬥焚殺案內各犯，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朝

把臺灣械鬥焚殺案內各犯二百八十九名，從重發往新疆安置。⁽⁷⁾又如，臺灣和福建沿海漳州泉州械鬥案犯，從乾隆四十四年（1775）到四十八年（1783），竟有六次分類械鬥案，重犯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發遣新疆給種地兵丁為奴。雖說遭犯的承種條件不如民屯，但大多數遭犯是給出路的，年滿後就地轉成和編入民籍。

以上所述，軍屯、民屯和遣屯經營共同起始開發邊疆保衛邊疆維護祖國統一的歷史作用。其社會效果還表現在邊地人口增加。據〈巴里坤縣誌〉記載，嘉慶十一年（1806）當地有15,298人，而從道光初年至末年，人口從21,000人增加到30,000人。此外，新疆統一之初，巴里坤設理事同知、直隸廳，並設辦事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置府為鎮西，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鎮西廳歸新疆省鎮迪道，後在民國初年設立縣治，說明在此地邊疆的建置已和內地趨同劃一。

漢廟與馬祖廟

新疆巴里坤在清末乃至民初曾有“廟宇冠全疆”的美稱。其中漢廟類別繁多。顯然和關內不同地區漢人因不同原因移住新疆地區關係甚大。從廟宇的種類上看，涉及儒釋道和各種民間信仰，其中地域性信仰的移植是一大特點。從建廟者的組織形式上看，鄉黨性質和行業性質尤為突出，不僅有山西、陝西、四川、甘肅、寧夏等西部地區同鄉所建的廟宇，而且還有山東、湖北、湖南、福建等南方省份同鄉所建的廟宇。

巴里坤廟宇多，每年月月有祭祀和廟會，以及酬神演戲。如：正月十五有老君廟、財神廟、涼州廟、無量廟等廟會；立春有牛王公唱戲；四月有娘娘廟會，城鄉婦女踴躍逛會；五月是關帝廟祭典和地藏寺、仙姑廟會期；六七月是三清廟會和文昌宮魁星閣祭期；八月是文廟祭孔；九月是龍王廟會等。廟會期間既有進香朝拜，也有商貿活動，搭臺唱戲是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娛活動，其中秦腔、眉戶流行，也有花鼓戲，反映了不同地區移民的不同民

俗愛好。說到各種漢廟祭祀，其內容和因由不一，也體現了漢人社會文化傳承的整體性和地域性。

文廟。儒學在漢人社會的長久傳播早已深入人心，表現在國家對儒學的制度性規劃與實施。不僅如此，全國遍建文廟。雖然學術界一般並不把儒學算做儒教，但歷史上官方和民間的祭孔儀式十分隆重，大有宗教信仰祭祀的意味。新疆巴里坤的文廟與祭孔活動也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禮儀過程。例如民國期間，在文廟的祭孔活動分春秋兩祭，供香火，獻祭牛羊和瓜果，縣長充當主祭官。由於民國廢除秀才，改由鄉村教師做司儀。大成殿前，引路東西各有一個香火池，人們頂禮膜拜，依次行動獻禮。巴里坤的文廟祭祀參加者不分省份、職業，是遠離中原的漢人族群認同的重要文化儀式。

關帝廟。光緒末年《鎮西廳鄉土志》記載巴里坤“四營有四營之廟，三鄉有三鄉之廟，廟宇之多巍巍然，誠一郡之壯觀也。”據〈巴里坤縣誌〉記載，自康熙五十八年（1719）富甯安修建了第一座關帝大廟起，到19世紀末修建左文襄公祠之間，巴里坤滿漢兩城和城郊一共有廟宇五十七座，東西北三鄉有廟宇三十三座。關羽，關雲長，三國時蜀漢大將，因勇猛善戰，忠心為主，受後人稱贊。清統一全國後，對關羽大力推崇，最終封為“忠義神武靈佑神勇威顯保民精誠綏靖羽贊宣德關聖大帝”，稱之為“戰神”，地位甚至超過了“文聖”孔子，命全國建廟，行“春秋二祭”。清統一新疆後，為了宣揚武威，企求邊陲安定，遂遍建關帝廟，有官府定期祭祀。洪亮吉在〈天山客話〉中記載：“塞外雖兩三家，村必有一廟，廟皆祀關神武，香火之盛，蓋接千西海云。”巴里坤也如是，數關公廟最多。實際上關羽成了漢人心目中可以保護人民克敵致勝消災祈福的神靈。巴里坤的關帝廟或和關帝相關的廟宇、祭祀點有東關大廟、東城門樓、大廟（山陝會館）、山西廟、關帝廟、關公廟、老爺廟、天山廟。這最後的天山廟在口門字山頂峰上，或許是中國西部最高的關帝廟。

昭忠祠。昭忠祠的大殿裡沒有塑像，祇有密密麻麻的神主牌位，排位上寫有收復新疆陣亡的川軍

和湘軍將士的名字，清明和七月十五，人們都來此焚香化表，祭奠捐軀先人。

土地廟。巴里坤漢城四座城門外都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廟。廟小殿也小，殿上供奉着土地爺和土地奶奶的塑像。他們倆並排安坐，頗有融樂的家庭氣氛。土地廟沒有定期廟會，其香火由平時許願的各種人送來。哪家人蓋房修房開田築壩，都要給土地廟燒香叩頭。他們跪在土地爺面前念念有詞，說明自己要做甚麼，請土地爺是為了甚麼。供品極其簡單，但祇要到土地廟許願，家裡的事就平安了。土地廟的祭祀和漢人農業社會的家庭生計與生活安定關係極大，不可不祭。這是漢人社會久遠以來的文化遺產，因此官方建城池也會在設計上留下來自人民的祭拜空間，象徵和寄託的意義是不可或缺的。

娘娘廟。巴里坤的娘娘廟的山門正對是三間大殿，供奉龍王。再進一個套院才是娘娘殿。風姿綽約靈秀無比的娘娘塑像，民間說是王母娘娘，讀書人說是女媧娘娘等，然而在這裡都是專司生育的女神。她的左下側有保證順利降生的六位神仙塑像，從生育到保健的全部事宜都隨時有責任由神仙召喚，如果生育順利，則需要還願，唱戲酬神。

山西廟。山西人的同鄉會館人稱山西廟，這是巴里坤建築藝術最高的建築之一。會館的山門雄偉，左右有威武雄獅一對。山門的上層有倒座的戲樓，從街面上看是門樓，上面有“山西會館”匾文。大殿也是雙層，下層供關公和周倉塑像，雙聯上寫有“義氣千秋，瓦古一人。”山西廟的廟會每年有兩次，一次在正月，一次在五月。因五月十三過會是會下雨的，因為這是關老爺的“磨刀雨”，因此有乞雨的性質。然而，在廟會上，同鄉會買一些零食送到看戲和過廟會的老鄉手裡，以示關愛。地方族群認同的聚合力很容易在廟會上體會到。

秦州廟。秦州廟是甘肅秦州人的同鄉會館，山門小，但工藝精巧，供着秦州城隍。巴里坤有損秦州人的諺語：秦州咁，捨命不捨財。是說他們的說話尾音好用‘咁’，又說他們慳吝。這種說法反而表明秦州人人數不少，有一定的影響力。

乾州城隍廟。為甚麼建乾州城隍廟？一是為流

動和定居的乾州客商祈禱來自故鄉的地方神保佑發財致富，二是乾州的“乾”字和巴里坤的“坤”字剛好構成乾坤。移民和當地人借此可以尋求和睦相處的共同象徵建築和共同的思想寄託。於是乾州城隍廟便建築在巴里坤城隍廟之側。

螺祖廟。傳說螺祖是主蠶農的神，可是根據巴里坤的氣候與生態條件，這裡則根本不能養蠶。原來螺祖廟也是四川人的會館。因此，巴里坤的螺祖廟是四川同鄉會館兼祭拜螺祖女神。

仙姑廟。在巴里坤的帝藏廟西側，仙姑廟和其它大廟相似，有山門、戲樓、廂房和大殿。殿裡供奉的少女塑像就是“八仙”裡的何仙姑，可有人說不是，而是甘肅的仙姑。她為了尋求自主幸福毅然離家西出陽關直奔西域，還說她為了不迷途，走一路牽一路毛線，直到巴里坤。因此說仙姑廟裡的塑像手裡還捧著毛線。每年五月二十五是仙姑廟會，唱三天戲，女香客摩肩接踵來燒香許願。仙姑廟同時還是甘肅張掖人的會館，因此又稱甘州廟。相鄰的地藏寺則是甘肅民勤籍的客商捐資興建的，在仙姑廟會前幾天的五月十六地藏廟會就開始了。

海神廟，馬〔媽〕祖廟。苗逢春是福建某州的移民，來巴里坤已有八代人。當我們採訪他時（2001年8-9月），他說他在1977-1978年跟父親到山里拉柴，曾問父親祖先的來歷。父親說爺爺總是提到祖先被充軍從福建某州押解到巴里坤，他們步行從福建走了幾年時間才到目的地。住下以後，又有人偷盜往西跑，結果他們發現舉目無親，不得不又回來了。他們總說，祖先住在海邊多好，巴里坤太冷，我們的許多習俗至今到第五代人還保留着故鄉的葬俗。第二天我們在新疆流放研究專家周軒先生和哈密文管所考古學者小于陪同，考察了位於大河鄉一帶的海神廟遺址。從地表遺物觀察（瓦當質地和圖案），海神廟不會晚於18世紀。這裡遼闊的旱地和草場需要海神嗎？今日井然有序的農業用地上的海神廟遺址，是否和福建籍移民相關卻不得而知。另，巴里坤發現的乾隆年間鑄造的馬祖廟鐵鐘，是為保佑地方牲畜膘肥體壯。但地方文化人則

認為在不同地理環境馬祖祭祀的內容也會變化。例如上述螺祖廟的內涵早已從分香者祭蠶神的初衷轉換成巴里坤四川移民的地方認同標誌了。問題的關鍵是新疆巴里坤的海神廟和馬祖廟的祭祀偶像以及神明所照察的人生範疇與關煞控制，究竟是如何在移民過程中不斷變化的，正留待進一步的調查。我們拍攝了馬祖廟遺址旁存留的老榆樹，昔日的馬祖廟和海神廟破敗了，但留給我們和地方文管人員進一步的調研課題。

在巴里坤和新疆其它地區的多類型漢廟祭祀，和中原文化的淵源密切相關。巴里坤文廟顯然是中原文化在西北邊陲涵化的結果，而關帝廟則是武廟。內地乃至海外的關帝廟或關帝供奉多為恭喜發財的寓意，而巴里坤的關帝廟則成了統一中華安定邊陲的象徵。昭忠廟是祭奠為統一而征戰的烈士，而許多年以後則變成那些征戰烈士的共同地方屬性（川軍和湘軍）的認同標誌。來到邊陲的屯駐者修建土地廟和娘娘廟等，有明確的安居樂業和家族延續的功能性需求。那些地方會館式的山西廟、秦州廟、甘州廟或乾州廟廟會上濃厚的人情味，帶給屯墾戍邊的內地人無限的安慰。數百年來，在巴里坤來自內地的人經營了七十餘座廟宇。那些到西北做官的人、流放入籍的人以及隨軍屯駐的人，他們在晚年，或在特定的時期，當他們希望捐一個廟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蓋一座他們在自己遠方的家鄉所熟悉的廟宇。如上所述，一些原生的信仰保持了下來，一些則變異了。而變異的主要根據則是對移居地信仰的適應性結果。

現在，巴里坤文管所的研究人員正以濃厚的興趣參加對福建籍屯民後代的追訪工作。他們確信，移民從一個文化區域轉入另一個文化區域以後所發生的文化連續性與適應性變遷的情況，是完全可能的。例如仙姑廟、馬〔媽〕祖廟、娘娘廟和海神廟祭祀內涵的探究就是一個可預見的、有意義的課題。因此，不僅中原地區流行的廟宇可以在新疆出現，而且東南沿海的神明信仰也會在巴里坤留下痕跡，其中包括海神廟和馬〔媽〕祖廟。